

# 单极体系的影响与中国的战略选择<sup>\*</sup>

刘 丰

**内容提要:** 尽管冷战后形成的单极体系已存在 20 年之久,但是学术界对这一特殊国际结构的研究尚不充分。本文考察了单极结构在体系层面的基本特征以及这种结构在单元层面造成的影响,尤其关注单极体系的稳定性以及这种结构下主要国家的行为倾向。从现实主义有关国际体系变迁的理论论述出发,本文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正处于弱化过程中,而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和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是削弱这一结构的基本动力。由于中国是单极体系下成长最为迅速的国家,与美国之间构成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为了摆脱单极体系下的崛起困境,中国需要采用各种战略手段以规避不利冲击和反应,保障国家的和平崛起。

**关键词:** 单极结构 体系效应 大国行为 中国崛起

冷战结束后,中外学界和政界曾就国际格局问题进行过长期的争论,出现过“单极”、“多极”、“一超多强”、“多极化”等多种代表性观点。这种争论一方面反映了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复杂性和变动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各国政治家和学者对国际政治现实的理解差异。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外学者开始接受“单极”这一观点,并且试图从不同方面揭示单极这一特殊的体系状态,探讨其对国际政治基本特征和国家行为的影响。从综合实力的角度看,当前的体系之所以能够

---

\* 本文是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NKZX B10149)成果。文章初稿曾提交 2010 年 11 月 13 日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后危机时代中国的国际安全环境与战略机遇”研讨会讨论,在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陈永、陈小鼎、陈志瑞、蒲晓宇、左希迎等人以及《欧洲研究》杂志约请的匿名评审专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笔者在此谨致谢意。

称之为单极体系,主要是因为美国的综合国力远远强于其后面的次等大国,不仅从经济、军事和科技等物质性权力对比上来衡量是如此,在政治影响力和软实力等社会性权力方面,其他国家也难以与其抗衡。

尽管形成了一些研究成果,但是总体上看,学术界对单极状态仍然缺乏深入探讨。甚至直到许多学者认为美国单极独霸的局面即将由于新兴大国的崛起和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而逆转时,学术界对单极体系状态的研究也才起步不久,对其形成、维持和转变的条件和机制的揭示远不充分。<sup>1</sup> 无论单极体系还能持续多久,也无论各国政府对未来国际格局有何种设想,时局的暂时变动和政治话语的引导不应该左右严谨的学理思考。鉴于国际结构的性质、状态和变化趋势对于理解国际政治基本面貌以及国家间关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试图梳理判断这一体系的特征,分析其发展趋势,以便深入理解单极这一体系状态的形成、维持和转变,解释和预测这种状态下大国行为的基本倾向,并探讨中国在单极体系下的战略选择。

## 一 单极体系的(不)稳定性

国际关系理论界在讨论某种力量分布的体系效应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是,国际体系在这种结构下能否维持稳定,这为我们考察单极结构的体系效应设定了分析的基点。对于单极体系究竟能否带来稳定以及是否可以持续,它对主导大国和次等大国的行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美国主导的单极可能发生怎样转变等问题,不同理论立场的学者之间存在激烈的争论,而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单极结构对当代国际关系面貌及其未来走向的影响。

当代国际关系学者多从国际体系中实力分布的结构特征解释国际体系稳定性,尤其侧重对不同结构下国际体系稳定性的差异进行比较,形成了“多极稳定

---

<sup>1</sup> G. John Ikenberry,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1-27. 《世界政治》杂志 2009 年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与单极世界的影响”的专刊是冷战结束至今学术界对单极体系少有的专题讨论。之前有关单极体系的研究还有两本著作可以参考: Ethan B. Kapstein and Michael Mastanduno eds., *Unipolar Politics: Realism and State Strategies After the Cold War*,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9; Thomas S. Mowle and David H. Sacko, *The Unipolar World: An Unbalanced Futu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论”、“两极稳定论”和“单极稳定论”等代表性观点。<sup>1</sup> 这几种观点的实质是对体系的权力分布状况与国际稳定之间的关系做出确定的因果性论断,主张某种权力分布比其他权力分布更有利于保持国际体系的稳定性。

不过,我们考察国际关系实践可以发现,不同结构下的国际体系都存在稳定期,比如 19世纪欧洲主要大国之间的和平局面,20世纪 70年代美苏之间的缓和以及冷战后大国之间的和平;然而,三种结构也都存在动荡期,比如一战之间大国关系的紧张以及战争的到来,20世纪 50、60年代美苏之间关系的紧张甚至有爆发核冲突的危险,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前后其他大国对美国单边主义行为的激烈反应。此外,由于以下三点原因,我们很难就不同结构之间的稳定性进行比较:首先,就概念衡量而言,学者们通常根据维持和平的时间长短来判断体系的稳定性,但是由于每一种体系的存续时间长短不一,也由于战争的手段和形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人们很难对战争的频率和规模达成共识;其次,就方法论而言,上述三种体系结构的经验都是非常有限的,在当代国际体系中,都可以称得上是单个案例,根据唯一案例进行比较难免会降低可信性;再次,就历史进程而言,每种结构所处的时代特征的不同显然增加了比较的难度。我们知道,今天有关多极的经验主要来自二战以前的欧洲国际关系体系,当时发动战争比今天更加容易,使用武力进行领土征服并不被视为国际关系中的一项禁忌。而在二战之后,直接使用武力控制别国领土的行径已然式微,由此带来的征服和扩张的成本是国际体系中的大多数国家都需要考虑的。

鉴于此,我们与其比较不同结构下国际体系的稳定性程度,不如分析特定结构对体系稳定性的具体影响,讨论体系在哪些方面可能表现出稳定性,而在哪些方面可能出现不稳定性。当然,这种分析的前提是对国际体系的稳定性做出相对准确的界定。大多数学者从战争的规模和频率的角度讨论体系的稳定性,尤其是体系性战争。罗伯特·吉尔平并没有明确定义“稳定”,他只是将体系的稳定性理解为体系处于均衡状态之中,没有发生变革(即霸权更替战争)。他认

---

<sup>1</sup> 多极稳定论以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和莫顿·卡普兰(Morton Kaplan)等传统现实主义者为代表,参见[美]汉斯·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七版),徐昕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美]莫顿·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与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两极稳定论则以肯尼思·沃尔兹为代表,参见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Daedalus*, Vol 93, No 3, 1964, pp 881-909 “The Origins of War in Neorealist Theory”,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 Vol 18 No 4, 1988 pp 615-628;最明确的单极稳定论者是新古典现实主义学者威廉·沃尔福思(William Wohlforth),参见 William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2, 1999 pp 5-41.

为,如果一种国际体系中重要国家的利益及其相应的权力长期维持恒定不变状态,或者是,如果权力关系仅仅发生维持原有比例的分配的变化,那么这种体系就能无限期地处于均衡状态。<sup>1</sup> 罗伯特·鲍威尔在探讨体系的稳定性与实力分布之间关系时明确将稳定的操作化指标设定为战争的可能性。<sup>2</sup> 沃尔兹则指出,将和平与稳定混为一谈的做法不尽合理,大战发生与否并不能作为体系稳定与否的标志。实际上,即使发生了体系性战争,如果这种结构仍然能够持续,我们也可以认为这种体系具有相当的稳定性。”牛铭实(Emerson M. Niu)等人也注意到,在定义国际体系的稳定性时应该区分体系本身的稳定性与体系内资源分布的稳定性,前者是指体系内主要单元(国家和国家联盟)没有被消灭,后者是指体系的资源分布没有发生显著的重新分配。<sup>3</sup> 从这个角度看,体系的稳定性不仅涉及是否发生体系性战争,还涉及战争之后原有体系的基本秩序(资源和利益分配状况)是否改变。

从既有文献来看,理解单极体系的稳定性应该从国际体系内部调整的和平性以及体系本身的持久性两个角度进行考察。<sup>4</sup> 首先,国际体系内部调整的和平性主要是指体系内部是否爆发大规模战争,其中可以根据战争的参与方划分四类不同的战争:(1)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导大国之间的战争;(2)体系中的主导大国与体系中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3)有主导大国支持或操纵的其他国家之间的战争;(4)没有主导大国介入的战争。除了考察军事冲突是否发生,还需要衡量冲突的规模、持续时间、参与方和烈度。其次,体系本身的核心特征是否能够持久。这些核心特征主要包括单极国家与次等大国之间的力量对比态势、单极格局下的国际秩序和规则安排、单极体系下国家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等。

<sup>1</sup>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 13.

<sup>2</sup> Robert Powell “Stabilit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World Politics*, Vol. 48, No. 2, 1996, pp. 239–267.

<sup>3</sup>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1993, p. 45.

<sup>4</sup> Emerson M. Niu, Peter C. Ordeshook and Gregory F. Rose *The Balance of Power: Stability in International System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p. 61–67.

<sup>5</sup> 沃尔兹对体系稳定性的界定也存在一定的变化。他在1964年的一篇文章中将体系的稳定性定义为国际体系内部调整的和平性以及体系本身的持久性,在1967年的文章中认为“稳定”是指结构的存续没有出现严重的毁灭性暴力。不过,在1993年的文章中,他认为不能将“和平”与“稳定”等同起来。See Kenneth N. Waltz “The Stability of a Bipolar World”, p. 88; Kenneth N. Waltz “International Structure, National Force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1, No. 2, 1967, p. 23; Kenneth N. Waltz “The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45.

由于体系的持久性涉及体系的转换路径,我们将在下文再作分析,在此首先考察单极体系的和平性。

沃尔福思认为单极有利于和平主要是因为其他国家无力挑战美国的超强实力。如果仅根据主要大国(包括主导大国和次等大国)之间是否发生战争来判断,我们的确可以认为冷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单极体系表现出了相当程度的稳定性。不过,导致战争的发生与和平的维系的原因来自多个层次,尽管体系层次的因素具有长期的影响,但是两个国家之间发生战争和维持和平的直接原因还涉及诸多单元层次的因素。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在分析冷战后主导大国之间的和平时指出,这种和平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比如核武器的存在、几大国之间形成的安全共同体、战争成本及战争观念的变化等。<sup>1</sup>

然而,主要大国之间的和平只是稳定的一个指标,单极结构至少在以下两个方面破坏了国际体系内部调整的和平性:首先,即使单极结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次等大国以军事手段向主导大国提出挑战,但是这种结构几乎无法抑制主导大国发动的战争。明显缺乏制衡力量的特征为霸权创造了使用军事手段达到自身目标的动力;其次,这种结构甚至为弱势力量使用暴力手段提供了更强的激励,对于那些认为自己的不幸遭遇源于主导大国的国家和组织而言,它们更倾向于使用“弱者的武器”。<sup>2</sup> 冷战后恐怖主义的盛行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危机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这种特殊的结构造成的。从体系层面的影响看,在冷战后美国主导的单极结构下,主要大国之间保持了和平,这是其体系稳定性的一个表现,但是这种结构既无法阻止极国家本身发动的战争,也不能抑制弱国或其他组织通过暴力方式争取自身生存的动力。

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Brooks)和沃尔福思等主张单极稳定论的学者不仅认为单极有利于维持和平,也认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具有相当长的可持续性。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单极体系是最不稳定的力量配置,也无法持久。比如,沃尔兹就指出单极体系由于两方面的原因缺乏可持续性:一方面,主宰大国在自己的疆界之外承担的任务过多,由此从长期来看将使自己的力量遭到削

<sup>1</sup> 杰维斯对冷战后主导大国之间的和平作了最为详细的考察,参见 Robert Jervis “Theories of War in an Era of Leading-Power Peac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6, No 1, 2002 pp. 1 - 14.

<sup>2</sup> Kenneth N. Waltz “The Continuit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Ken Booth and Timothy Dunne eds., *Worlds in Collision: Terror and the Future of Global Or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2, p. 352.

弱;另一方面,即使一个主宰大国以温和、克制、忍耐的方式行事,较弱国家还是会担心它将来的行为。面对失衡的权力,各国会试图增加其自身实力或者与其他国家结盟以恢复国际实力分布的均衡。<sup>1</sup>此外,一个国家出于谋求和维护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于现存体系中的利益分配方式和秩序总会采取维护或者变更的态度。体系中的大国如果认为体系中的运行机制损害或不符合本国利益就会谋求变更,这种变更自然会影响到体系内规则和秩序的持久性。

对于单极体系的持久性,我们可以从理论和现实两个方面加以考察。从逻辑上看,任何一种体系内部的权力分布都会发生或剧烈或缓慢的转变,当这种变化完成了量的积累,就可能导致体系结构的根本性变化。实际上,任何体系都不会永远存在下去,而是具有终结的可能性和趋势,单极体系尤其如此。<sup>2</sup>单极体系的衰落和弱化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动力:首先,无政府状态下大国竞争的压力以及社会化过程带来的“趋同效应”(sameness effect)会削弱单极霸主的实力优势;其次,主要大国之间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增长率的不同会使力量天秤朝着对崛起国家有利的方向倾斜。总体而言,在无政府状态下,由于霸权国的存在与扩张,大国竞争的压力更加凸显,其他大国会通过学习和模仿成功的经验来加快自己的发展,同时在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作用下,一国或者多个次等大国通过积聚实力重新回到大国行列,将会使体系中的实力分布逐渐向均势回归。”

## 二 单极结构对大国行为的影响

单极结构在单元层次上也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改变了大国之间互动的基本模式。冷战结束以来,学术界有关大国行为的争论主要从两个角度展开:其一,关于极国家的行为倾向,是一个良性霸权还是恶性霸权,进行霸权护持的方式是强力手段还是柔性手段,对待其他大国是采取压制还是容纳;其二,关于

<sup>1</sup> Kenneth N. Waltz “Evaluating Theori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91, No 4, 1997, p. 915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2000, pp. 27- 28.

<sup>2</sup> 近来的讨论包括 Christopher Layne, “The Waning of U. S. Hegemony—Myth or Reality?: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1, 2009, pp. 147- 172; Randall L. Schweller “Entropy and the Trajectory of World Politics: Why Polarity Has Become Less Meaningful”,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23, No 1, 2010, pp. 145- 162.

» 有关单极体系衰落和变迁的详细讨论,可参见刘丰:“均势生成机制的类型与变迁”,《欧洲研究》2009年第4期,第15-19页。

非极国家的行为倾向,主要次等大国是否对霸权国美国采取了制衡行为,为何没有进行制衡,未来是否可能进行制衡。大国行为是制衡还是追随抑或其他?<sup>1</sup>在此,我们可以从单极体系对主导大国的影响及其对次等大国的影响两个方面加以讨论。

### (一)单极和主导大国的行为

对于力量超群、失去制衡的主导大国而言,单极体系为其带来的机遇大于挑战。从冷战后国际关系的现实发展看,单极体系对主导大国(美国)的行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影响:

第一,扩大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根据现实主义理论,一个国家实力地位的提升会扩大其国家利益界定的范围,超强的实力甚至会带来过度扩张的危险;只有出现与之匹敌的权力,才能有效制约霸权国对权力的滥用。美国在冷战后采取的一系列单边主义行为也基本符合现实主义理论的预期。单边主义主要是指一国在对外政策中一味按照本国的利益和意志行事,不顾及别国的利益、立场和呼声,不与别国协商或合作,不受国际行为规则的约束。作为一种外交政策倾向和行为方式,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是对应的。在此,我们并不假定多边主义行为一定优于单边主义行为。因为一国出于自身利益或其他方面的考虑,在处理对外关系时并不需要总是与其他国家进行协商或合作,尤其是在维护核心国家利益的情况下,表现出一定的单边主义行为也无可厚非。而且,多边主义还存在成本较高、效率低下、流于形式等问题。但是,如果一国的单边主义行为总是超出自身的核心利益、侵犯他国利益、违背国际行为的一般准则,那么这个国家的行为就会对其他国家乃至国际秩序产生不良冲击,这很难被认为是一种理性和审慎的选择。尤其在这个国家是霸权国的情况下,单边主义行为占主导就会损害其作为领导者的威望和影响力,削弱既有国际规则和程序的公信力,破坏它与其他大国之间达成的合作关系。缺乏结构性约束使美国具有相当大的政策调整自由度,在单边主义做法有损美国国际形象、无益于推进美国利益时,历届美国政府的政策和行为也会进行适当调整。不过,以单边主义、军事力量的优先性、价

---

<sup>1</sup> See G. John Ikenberry and Michael Mastanduno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Introduction: Unipolarity, State Behavior, and Systemic Consequences", pp. 1-27. Thomas S. Moore and David H. Sakka, *The Unipolar World: An Unbalanced Future*

值输出和权力扩张为特征的基本模式并没有太大的变化。<sup>1</sup>

第二,强化主导大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冷战后,强调体系因素的结构现实主义因忽视国内政治因素而受到广泛批评,实际上这种困境并不意味着结构现实主义失去了解释力,因为恰恰是结构的变化凸显了国内政治的重要性。国家行为取决于国家的内部特性还是国际环境是一个因条件而异的问题。那些强大的国家受到的结构压力较小,它们更有可能摆脱结构的束缚,霸权国家尤其如此。正如沃尔兹所说,一些国际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制约比另一些结构更强,而单极结构弱化了结构压力,扩大了美国的活动领域,凸显出其内部特性的重要性。<sup>2</sup> 冷战后,美国的行为受到其意识形态诉求的左右,也受到国内政治思潮变化的影响。在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超强地位导致美国过分追求其意识形态上的目标,偏离了正常国家利益的范畴。一般而言,国家对利益的界定会随着权力的增强而扩展,但并不是国家追求的任何目标都可以被归入到国家利益的范畴。美国的一些目标明显具有意识形态的色彩,比如维护美国至高无上的地位,扩展美式民主、人权、自由等价值观,推行“华盛顿共识”等。单极体系给了美国更大的回旋余地,可以突破合理的国家利益的范畴,肆意妄为地推行这些带有极强意识形态色彩的价值观。”

第三,减弱主导大国提供国际公益的动机。无论在何种国际结构下,霸权国能否为国际社会提供公益都是其能否得到接受和认可的绩效基础。为了让其他国家接受自身的领导地位,潜在或实际霸权国仅靠军事上的胜利和强制是远远不够的,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国内政治的暴政只会导致反抗更加强烈。霸权国为了让其他国家服从其领导,必须让这些追随的国家觉得“有利可图”,提供“公益”。在国际关系领域,常见的公益主要有自由贸易、经济援助、冲突调解、安全保护等。在两极体系下,为了与苏联对抗,作为霸权国的美国有强烈的意愿进行公益供给。一方面,美国为其盟国提供安全保护,允诺在对方入侵时提供军事帮

<sup>1</sup> 梅尔文·莱夫勒指出了这一点,他认为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延续性大于变异性,“9·11”事件带来的调整并不是根本性的。See Melyn Leffler, “9/11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iplomatic History*, Vol 29, No 3, 2005, pp 395-413

<sup>2</sup> Kenneth N. Waltz,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in the World”, in I William Zartman, *Imbalance of Power: US Hegemony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9, p 31

<sup>3</sup> 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等认为,在国际上肆意妄为(free hand)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持久特征,无论在哪多极、两极还是单极体系下都是如此,不过,单极体系为意识形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主导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参见 Jack Snyder, Robert Y. Shapiro and Yaeli Blich-Elikon, “Free Hand Abroad, Divide and Rule at Hom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155-187.



助；另一方面，美国还承担大量的防务开支，减轻盟国的负担和压力。然而，在单极体系下，美国提供国际公益的意愿明显下降。在经济领域，美国奉行狭隘的贸易保护主义，破坏了开放性的国际经济体系，在一系列地区性金融危机中经常袖手旁观，或者在援助方面附加苛刻条件。在安全领域，为了维持美国的主导地位，追求绝对的安全，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激化地区安全局势、加剧地区安全矛盾的做法，对于与自身利益无关的冲突没有意愿加以解决或协调。约瑟夫·奈（Joseph S. Nye）将美国承担的国际公益归纳为六种，分别是维持区域力量平衡、推动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保持国际公地的共享性、维护国际规则和制度的效力、对经济发展提供援助以及充当冲突的调解人。<sup>1</sup> 如果根据美国在上述六个领域中的表现来衡量其对国际公益的供给，我们会发现，冷战结束后美国在每个领域进行公益供给的意愿和规模都大大下降。

布鲁克斯和沃尔福思在一本有关美国主导地位是否受到约束的专著中指出，尽管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一系列美国受到制约的因素，比如权力制衡、国际制度、经济相互依赖和正当性等，但从现实来看，这些外部制约并没有削弱美国主导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也没有限制美国可以推行的安全政策的范围。正因为单极体系提供的机遇，美国没有采取积极的自我克制政策，而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去改变世界，尽管造成的结果是对世界的伤害。<sup>2</sup> 尽管他们对美国不受任何约束的判断有些言过其实，但是在体系层面上能够制约美国外部行为的因素的确较小，这一事实是单极结构使然。

## （二）单极与次等大国的行为

与单极结构强化主导大国的行动自由相对应，这一结构明显缩小了次等大国的行动自由。”这种行动受限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次等大国自由选择结盟对象的可能性降低。根据沃尔兹对制衡行为的预测，国家倾向于与较弱的国家结盟以抗衡较强的一方，“如果能够自由选择，次等国家将聚集到较弱的一方，因为威胁它们安全的是较强的一方。如果它们加入的联盟有足够的防御和威慑能力以吓阻敌对联盟的进攻，它们将得到更

<sup>1</sup> Joseph S. Nye, "Recovering American Leadership", *Survival*, Vol 50, No 1, 2008, pp 64-65.

<sup>2</sup> Stephen G. Brooks and William C. Wohlforth, *World Out of Balanc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 笔者在这里的判断与施维勒的判断相反，施维勒认为当前的单极体系对单极国家和其他行为体的系统限制都非常弱，因此，“极”是一个没有意义的概念。施维勒的观点参见 Randall L. Schweller, "Entropy and the Trajectory of World Politics: Why Polarity Has Become Less Meaningful", pp 145-162.

多的尊重和安全”。<sup>1</sup> 从这段论述来看,沃尔兹对外部制衡行为的预测是有条件的,而不是决定论的,他限定的第一个条件是国家能够自由选择。按照沃尔兹对结构变迁与国家行为之间关系的论述,国家的行为是随着其实力地位的变化而变化的,两极结构下的大国比多极结构下的大国享有更大的自由。这是因为,在多极结构下,几个主要大国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赖关系,尤其是在军事上需要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而在两极结构下,两个主要大国彼此独立,相互依赖的程度非常低,它们各自还有一群追随者。<sup>2</sup> 两个极国家在进行战略选择时,不必过多考虑其他国家的态度。一个国家在国际关系中自由选择的余地通常是与它的相对实力地位成正比的。在单极结构下,因为霸权国可供调配的资源最多,可供选择的战略手段最丰富,所以它的自由选择余地最大。霸权国的存在也减小了次等大国选择的余地,要么与之对抗,要么与之为伍。如果与弱者结盟,无疑将自己置于与霸权国直接对抗的位置。从自由选择的角度看,在单极结构下,联合弱者对抗强者的趋势将变小,即使选择与弱者联合,结盟的时机和条件也更加复杂。”

其次,次等大国与主导大国展开直接军事对抗和军备竞赛的自由度下降。当体系中的实力分布从多极转变为两极、或者从两极转变为单极时,权力集中程度呈现出显著加强的趋势,由此也提高了其他大国制衡的实力门槛。一个强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越大,拉近距离所需的时间就越长。在实力差距太大的情况下,如果贸然与霸权国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从短期来看,将大量经济资源转化为军事能力,将军事潜力转化为军事实力,并不会显著改变当前体系权力高度集中的现状;从长期来看,资源过分向军事领域倾斜将削弱与霸权国竞争的基础。在“黄油”与“大炮”二者之间取舍与平衡是每个大国需要面对的难题。在当前形势下,通过有限的军事投入巩固自己的实力基础、保障自身的国家利益、在经济发展与军事建设之间进行平衡,同时又避免与美国展开直接的军备竞赛,这些无疑是那些次等大国明智的战略选择。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单极结构明显制约了次等大国针对主导大国的制衡行

<sup>1</sup>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27.

<sup>2</sup> Kenneth Waltz “Reflections on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 Response to My Cr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30-333.

» 有关单极体系下的结盟模式的分析,参见 Stephen M. Walt “Alliances in a Unipolar World”,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86-120.

为,使传统上均势生成的主要机制难以发挥作用。不过,我们也可以发现,单极体系下对美国制衡最强烈的是那些遭到美国敌视、生存完全没有保障的中等国家或小国。对于它们而言,无论对抗与否都有可能成为霸权国攻击的对象,反而会采取冒险行动获取非对称性威慑手段,尤其是核武器。这种行为也符合前景理论的预期,即“当行为者认为如果不采取冒险行动将遭受更大损失时,它们倾向于接受更大的风险”。<sup>1</sup>一旦这种冒险获得成功,将给它们带来巨大的收益。不过,这样的国家毕竟只是极少数,对于有能力维持自身安全的次等大国而言,可以根据核心利益受到现实威胁的程度来选择制衡行为的强度,保持成本和收益的平衡。总体来看,主要次等大国制衡美国霸权的强弱程度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的变化趋势:其一,在实力竞争中,主要大国能否保持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显著缩小与美国的实力差距;其二,美国的外交政策是否会做出显著的调整和改变,扭转单边主义和霸权扩张的势头,容纳次等大国的利益需求。

### 三 单极结构下中国的战略选择

从上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单极结构是一种对主导大国相对有利、而对次等大国相对不利的体系状态。中国是单极体系下上升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国家,其在崛起过程中必然要面对如何与主导大国竞争、提升在既有体系中的地位的问题。作为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我们必然更加关心单极体系对中国的影响以及在这种体系下如何保障自身和平崛起的问题。因此,在讨论了单极结构的体系效应及其对大国行为的影响的基础上,我们有必要审视单极结构对中国崛起的影响。

尽管我们根据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规律可以对未来权力格局和单极秩序的转换做出比较乐观的估计,但是从短期来看,这种转化还在量的低度积累阶段。这是因为,即使美国遭遇了2008-2009年的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其在水世界经济中的绝对优势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对于美国在最近的经济危机中的衰退程度、持续时间和具体影响,各国学者们意见不一。无论在经济学界还是国际

---

<sup>1</sup> Robert Jervis “Unipolarity: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 200

关系学界,“美国经济衰落论”都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sup>1</sup> 但经济数据表明,在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不降反增。从世界银行修正后的经济数据来看,2008年的美国经济占世界经济的比重为23.4%,2009年为24.5%。相比之下,2008年和2009年中国经济占世界经济比重分别是7.1%和8.4%。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场源于美国的危机对欧盟、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以及其他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影响更大。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出现的“美国衰落论”更多源于美国学者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他们中的大多数并不认为美国实力衰落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而是要提醒美国决策者和民众采取措施阻止美国衰落。<sup>2</sup> 正如约瑟夫·奈所指出的,美国政府历来对自身的实力变化感到敏感,而且可能采取过度反应来扭转对自己不利的趋势。<sup>3</sup>

在无政府状态这种竞争性体系中,大国的崛起和衰落难以避免。一个国家崛起的动力来自其内部,而能否成功崛起最终取决于其经济模式、社会组织和政治制度是否具有竞争力。不过,在单极体系下,崛起成败也受其能否采取明智战略的影响。这是因为,单极是一种相对不利于崛起国家的国际结构,在这种结构下,霸权国以霸权护持为基本目标,对次等大国崛起的“敏感度最高、容忍度最低和制约能力最强”。<sup>4</sup> 由于美国的首要战略目标在于维持单极地位、防止可能挑战霸权地位国家出现,又由于中美两国在冷战结束后失去了进行紧密合作的战略基础,美国对中国采取了接触与防范并重的政策,而随着中国崛起速度的上升和规模的增强,美国会采取遏制的政策。实际上,近年来美国政府越来越倾向于挤压中国可以利用的外交回旋空间的政策,尤其是奥巴马政府时期“重返东亚”的战略调整及其介入中国周边安全问题的举措明显具有针对性。

面对单极这样一种相对不利于崛起国家的国际结构,以及主导大国美国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和制约,中国要顺利实现崛起目标就有必要采取明智的战略,以

<sup>1</sup> Robert A. Pape “Empire Falls”, *National Interest* Issue 99 2009, pp 21- 34. 对这次经济危机的短期影响的分析参见宋伟:“国际金融危机与美国的单极地位”,《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5期,第31-39页。

<sup>2</sup> 代表性观点参见 Fareed Zakaria “The Future of American Power: How America Can Survive the Rise of the 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May/June 2008, pp 18- 43; Ashley J. Tellis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and U. S. Power”, in Ashley J. Tellis, Andrew Nathan and Travis Tanner eds., *Strategic Asia 2009-10: Economic Meltdown and Geopolitical Stability*, The National Bureau of Asian Research, 2009, pp 3- 35.

<sup>3</sup> Joseph S. Nye “American and Chinese Power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2010, pp 143- 153.

<sup>4</sup> 贾庆国:“机遇与挑战:单极世界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国际政治研究》2007年第4期,第57页。

缓解崛起的阻力,降低体系变革的成本,为内部的发展提供条件。<sup>1</sup> 基于上文有关单极结构下的体系效应和国家行为的分析,为了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周边和国际环境以保障中国的顺利崛起,我们认为,中国的战略选择需要综合考虑以下五个方面。

首先,在保持经济成长的规模和速度的同时,强化国家综合实力的质量。如果我们承认实力仍然是国际政治经济中的核心内容,是实现国家目标的基本手段,那么可以肯定,其他国家只有继续维持甚至提升崛起的速度与规模,才可能与美国进行持续的竞争。否则,只可能像过去半个多世纪里其他对美国地位构成挑战的国家(如前苏联、西欧、日本),尽管一度有赶超美国的趋势,但都未能改变力量对比向美国有利的一方大大倾斜的格局。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仍然是抓住有利于自身发展的机遇,进一步提升自己的综合实力,缩小与美国在综合国力上的巨大差距。需要强调的是,一国的经济总量只是其综合实力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在规模增长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强调质量的提升,尤其是获得庞大的商品和金融市场、掌握先进的科技创新和研发能力,使国家实力的持续提升获得强有力的支撑。

其次,在强调经济发展和增强国力的同时,逐渐减少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对美国采取必要的制衡行为。制衡行为根源于结构压力的作用,在存在潜在或实际霸权国的情况下,其他大国采取制衡行为或者至少为这种行为做准备是一种合理的选择;在霸权国将自己视为战略竞争者和潜在敌人的情况下,其他大国更要防备霸权国综合运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多种手段进行打压。在可以预见的未来,由于缺乏与之匹敌的力量的制约,美国不会放弃霸权护持的战略企图,也不会停止对中国核心利益的侵犯和干涉。鉴于单极秩序和美国霸权的本质特征,中国理应做好制衡霸权的充分准备。在当前的世界中,中国应该如何制衡美国,如何制定国家成长的长期战略,这些问题需要政治家的现实思考,更需要学术界的理论探讨。国家的制衡行为有内部制衡和外部制衡之分,然而,在不同的国际体系状态下,国家的战略选择侧重点却有所不同。在当前的单极体系下,国家的实力基础能扩大国家战略选择的空间,依靠以提升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潜

<sup>1</sup> 对于审慎原则及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应用,参见左希迎、刘丰:《国际政治中的审慎原则——思想源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外交评论》2008年第6期,第44-56页。

力为主的内部制衡途径是一种较为稳妥的选择。<sup>1</sup>

第三,审慎运用权力手段,显示维护自身核心利益的决心和意志。国际政治中的大国不仅需要强大的物质实力,也需要有使用这种实力的意愿。大国的意愿首先不是体现在进取型的外交政策上,而是体现在对自身核心利益的捍卫中。不逞强并不等于要示弱。在霸权国的挑衅和试探面前,中国应该理直气壮地维护国家主权、尊严和利益,有效地维护国家利益和威望,而不是刻意回避冲突和斗争,委曲求全。只有在国家主权和安全等核心利益表现出坚定维护的决心,才能够让霸权国有所忌惮,也才能得到其他国家的尊重。中美两国之间的互动本质上体现了崛起中大国同霸权国之间的角力。对成长中的中国来说,既要秉持审慎的战略,追求适度的权力和明智的国家利益,避免因为追求脱离现实的目标而过度扩张,更要勇敢地维护核心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利益不受损害。<sup>2</sup>如果能够遵循“明智的利益”和“慎用的权力”<sup>3</sup>的原则,对于中国这个新兴大国成长中价值诉求的定位,对于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外交战略的规划与选择,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第四,注重国家的影响力建设,塑造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实力和影响力是国家权力的两个支柱,即使一个大国没有争夺霸权的欲望,也要注重实力的积累,同时注重影响力的建设。<sup>4</sup>在无法达到物质实力的平衡之前,主要大国也可以利用美国霸权正当性下降的机会提升自身的影响力,与其在软实力领域进行竞争。<sup>5</sup>尽管美国霸权处于强势地位,但中国可以利用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

---

<sup>1</sup> 关于中国在冷战后是否对美国采取了制衡行为的分析可参见 Yuan-kang Wang “China's Grand Strategy and U. S. Primacy: Is China Balancing American Power?”, Center for Northeast Asian Policy Studies,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July 2006.

<sup>2</sup> 明智的国家利益是指“审慎地界定本国正当或适度的国家利益,不要过分扩张到别国无法接受的地步;而且在维护本国利益和安全的同时也承认和尊重别国的正当利益和安全考虑”。参见张睿壮:“中国应选择什么样的外交哲学——评‘世界新秩序与新兴大国的历史抉择’”,《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1期,第61页。也有学者指出,“尊重对方合法国家安全利益本身就是本国国家安全利益的一部分”,潘忠岐:“国家利益的主体性与中美安全关系”,《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1期,第16页。

<sup>3</sup> 张睿壮:“现实主义的持久生命力”,《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7期,第30页。

<sup>4</sup> 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重视对“地位”(status)的研究,实际上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主要是指影响力。关于单极体系下大国之间地位竞争的研究,值得关注的有 William C. Wohlforth “Unipolarity Status Competition and Great Power War”,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Deborah Welch Larson and Alexei Shevchenko “Status Seekers: Chinese and Russian Responses to U. 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4, No 4, 2010, pp 63-95.

<sup>5</sup> 布赞认为,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寻求大国地位的崛起大国而言,美国霸权的正当性危机是一个教训,表明中国也应该注重在国际社会的正当性。Ban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No 1, 2010, p 20.

理事国的身份反对美国滥用权力、以强凌弱的行为,而不是仅仅口头反对。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仍然需要保持维护国际正义的道义责任和原则立场。中国影响力的建设可以在秉持国际道义和提供公益两方面增加力度:一方面,秉持国际道义要维护国际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反对霸权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同时,还需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维持国际秩序;另一方面,中国应该提供国家实力地位相匹配的公益,维持国际秩序的正常运转,保证地区稳定与和平。公益的提供,可以提升中国的国家声誉,增强国家的影响力。实际上,美国霸权正当性的下降正为新兴大国争夺影响力、保持顺利成长提供了机会。

最后,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塑造良好的周边环境。中国在成功崛起为全球性强国之前,首先是一个地区性强国。在过去 20 多年间,出于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的需要,中国奉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实行“睦邻、安邻、富邻”的政策,对周边国家在经济和安全上分别采取了分享机遇和自我克制的策略,一方面依靠经济手段为这些国家提供稳定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在与自身核心利益直接相关的安全问题上进行战略安抚。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以往的周边政策的重心实际上在于“富邻”,希望以互惠甚至让利的方式换取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尽管我们在安全领域也采取了自我克制的策略,搁置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问题上的争议,但这种策略是稳定安全预期的一种消极手段,必须以其他国家给予积极和善意的回应为条件。如果无法得到善意回应,将使自身在这些问题上的核心利益遭受损害,并且丧失解决问题的主动性。目前的困境在于,许多周边国家在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的同时,也在不断强化与美国之间的安全互动。为真正达到维护自身和地区安全、缓解东亚其他国家安全忧虑的效果,中国在进一步提供经济收益的同时,在政治和军事上也需要采取积极的安全保障措施,尽量避免美国拉拢周边国家结成针对中国的同盟,积极发挥中国自身在塑造地区内经济和安全秩序中的主导作用。

总之,在霸权国的实力缓慢衰落,而其正当性无法得到次等大国以及整个国家社会广泛接受的情况下,新兴大国可以巧妙地利用时机,与霸权国在一些地区和领域展开影响力竞争,提供力所能及的国际公益,缓和周边国家以及整个国际社会对自身崛起的忧虑。历史表明,在实力迅速提升的同时,借助得当的策略规避不利冲击和反应,新兴大国能够保障国家的和平崛起。

(作者简介:刘丰,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系讲师;责任编辑:宋晓敏)

# Chinese Journal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9 No 2 April 2011

## ARTICLES

### 1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LI Shaojun

The concept of pow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fers to the influences an international actor exercises to change the behaviors of the others or its ability to exert influences. With or without coercive measures, the purpose of the use of power is to alter the will of the other actors' so as to bring about eventual changes. Two factors can be employed to judge whether interactions among the actors reflect the power relations. The first one depends on the actors' political intentions and the second on whether the results reflect the interactions of powers. Since the actor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ld divergent views about power being either an end or a means, they may display different patterns of behavior.

### 15 System Effect and State Behavior under Unipolarity: an Analysis of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LIU Feng

Although it has been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formation of the unipolar system after the Cold War, academic researches on this subject are far from adequate.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unipolar structure and its impacts 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state behavior. Based on the realist theory on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unipolar structure as dominated by the US is weakening, mainly driven by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powers and the unbalanced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At last, some suggestions on China's strategic choice is given in the concluding part.

### 30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Status Quo, Research Methods and Theoretical Comments

WANG Mingguo

A study on the effectiveness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s a cornerstone of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es in this field. In the past 40 years, remarkable advances have been achieved concerning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and the research methods. However,